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施立业
编

姚莹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施立业
编

姚莹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姚莹卷/施立业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300-20921-0

I. ①中… II. ①施…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姚莹 (1785~1853)-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9206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姚莹卷

施立业 编

Yao Yi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35.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52 000

定 价 8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 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 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 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导 言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又号幸翁。清安徽安庆府桐城县人。明清时期，桐城县是海内外闻名的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文物之邦”，左光斗、方以智、戴名世、方苞、张英、张廷玉、刘大櫟等大量乡先贤所流传下来的节操、功业等逸闻故事，所留下的遗迹和作品等等，构成了深厚的人文沃土。而麻溪姚氏则是桐城最著名的世家大族之一，“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其中流芳百世、驰名海内外者不乏其人，姚希廉、姚文然、姚范、姚鼐等众多先辈道德、事迹、文章，有口皆碑，积累了家族丰富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一代代后人。这些先天的、优良的人文基因，也成为了姚莹人格形成的要素之一。

姚莹出生时家境已衰落，因此早年生活磨难多多。出生时，正值大饥荒，死亡相继于道，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仅能勉强维持每天“一饭一粥”。6岁入学，师从方兰荪先生。7岁时，大家庭解体，刚分出的小家庭债台高筑，被迫卖房宅以偿债。此后，祖父和父亲长期在外地游幕教读以谋生计，母亲则带着其兄弟数人依靠租房栖身，辗转颠连，困顿不堪。8岁起，师从族兄姚维藩。姚维藩曾从姚鼐受古文学，且具经世思想，对姚莹成长有一定影响。姚莹母亲为大学士张英后裔，知书达理，勤奋治家，对其兄弟督教也甚严，不仅自任课余辅导，口授《诗》、《礼》二经，还经常讲述里中和姚氏先人史事懿行，引导其兄弟励志，以不坠“先业”。10岁时，家难连连，夏遭水灾，母子几人“浮板以栖”，“断炊竟日”；秋遭祖丧；冬又患痘症几乎夺命。在生活磨砺和母慈兄友的激励下，姚莹开始“悲愤苦读”，常常夜至四更而不倦。

嘉庆三年（1798），14岁的姚莹“已好为诗歌”。“束发之初，即思

慕古”，泛览汉魏至当代作者著述，“诵古人之言，求古人之义”，而“略知为人”。17岁，师从张藁园先生，结识张聪咸（阮林）。张当时已以文章名乡里，睥睨同辈，但初交姚莹，即尽焚己所作，叹曰：“世故有不朽之学，此不可羞耶！”18岁，与张聪咸、方遵道（履周）、吴庾（子山）、姚全（易卿）结集《蕉林五子诗钞》。他们志趣相投，以古人相励，“德业自期，贤豪自命”，“意落落不谐于俗，里中多非笑之，以为妄。”21岁，在姚鼐资助下，以府试第一名补府学附生。次年夏，以参加岁试赴安庆，就居姚鼐主讲的敬敷书院，“先生与言学问文章之事，始得其要归，而为之益力。”此时，姚莹交往的已有一批桐城籍有志青年学子，如张聪咸、吴庾、方遵道、姚全、光聪谐（律原）、刘开（明东）、左朝第（匡叔）、徐璈（六襄）、吴孙琰（子方）、李宗传（海帆）、朱雅（歌堂）、方东树（植之）、马瑞辰（元伯）、方秉澄（竹吾）、朱道文（鲁存）、胡方朔（小东）、吴云骧（岳卿）、方遵巘（子骏）、姚幼樵等。他们经常交游聚会，“有见以相质，有作以相示，或然或否，不必尽合，亦未尝强合也”，“皆以道义相切摅”，而挥斥古今，脱迹尘网，抗踪儒林，文采飞扬，又堪称风格相近，气类相投。他们自己言谈文字间也每每诤为“吾党”。在《赠吴子方》中，姚莹曾咏道：“自从宋明来，斯文更凋丧。中间数硕人，扶植各有臧。末流更分裂，同时相矛枪。遂使章句生，翻笑伊洛荒。文章亦绝轨，衰薄不足张。圣经如鸿钧，万态俱含生。泱泱沧海流，吐内河与江。……所以古哲人，不顾群言昌。独立为砥柱，障此百川狂。怀之不可见，我心实怦怦。”称这些人“吾所谓左右采获以取益者也”。里中交游，对他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由此可以想见。

嘉庆十二年（1807）秋，乡试中举第18名，座师为吏部右侍郎刘凤诰、刑部给事中赵慎畛，房师为梁本恭。次年春，会试中第32名，据说以书法不佳，殿试列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时虚龄24岁。会试文华殿大学士董诰、礼部尚书邹炳泰为正考官，内阁学士秀宁、顾德庆为副考官；殿试读卷官为礼部尚书瑚图礼、礼部尚书王懿修、工部尚书曹振鏞、吏部左侍郎潘世恩、礼部左侍郎桂芳、兵部右侍郎周兴岱、工部左侍郎周兆基、工部右侍郎陈希曾。同榜中有贺长龄、钱仪吉、魏元烺、隆文、钟祥、强克捷、陈官俊、周之琦等。凡殿试三甲，不得入翰林，循例归班铨选。十五年六月到达广州，入两广总督百龄幕，目睹了广东社会祸患及招降张保的情形。后又主讲香山县榄山书院。十六年春

应广东学政程国仁聘授经署中。是年，松筠接任两广总督，与之交往甚亲密，了解到不少西北边史地知识信息。十七年正月应聘教授从化县令王蓬壶之子王栻，完成编辑《援鹑堂集》工作。十九年（1814）辞从化幕，年终返里。在广东的六年游幕，是姚莹治学、写作精力最集中的时期之一，留下了《识小录》、《后湘集》等大量诗文作品。

二十一年（1816）赴京谒选，得福建平和知县。次年冬，调龙溪。两县皆官贪俗鄙、民风强悍之区。他厉行除暴安良之策，又倡礼让廉耻之风，亲民恤族，通达下情，勤于听断而民间无扰。二十四年秋，调任台湾县，旋兼理海防同知。道光元年（1821）春，兼任噶玛兰通判。他积极推动漳、泉、粤等客籍与土著和睦相处，破除五妖神迷信，组织抗震救灾，筹划兴办噶玛兰开发事业等。不久，接连遭父母丧。丁忧期间，主要游幕于闽台地区。其间曾于六年、十一年先后两次赴京师，与魏源、龚自珍、黄爵滋、汤鹏、吴嵩梁、徐宝善、张祥河、邓显鹤、端木国瑚、潘遵沂、汪喜孙、陈用光、管同、张际亮、鹿泽长、饶廷襄、李宗传、陈方海、吴嘉宾、郑云麓等一大批经世派人物结识和交游。在“世乃习委靡文饰”的时代，与这些人交往，不仅增广见识，而且“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大声振之”，形成声势，给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奋发之气。十一年，姚莹奉旨发往江苏，初奉命随行会办粮船回空、开坝倒塘、查赈等。后历任金坛、长洲、武进、元和等县。其中十二年冬，在武进任上，以疏浚孟渎等三河，日夜奔走于河干者3个月，次年二月最终完成了苏南地区这一大型水利工程。适得一子，遂命名“浚昌”，字“孟成”，以志喜庆。十四年秋，任淮南监掣同知。十一月代理两淮盐运使，数月之间，就将致使前任自杀的繁重的盐课收纳任务如期完成。次年二月回任监掣同知。十七年二月，再护理两淮盐运使，任内恤商而裕课。在“江南”的几年，以德才卓具、治绩优异，得到总督陶澍、巡抚林则徐赞赏。

十七年（1837）九月姚莹升署台湾道，次年闰四月莅任。针对游民充斥、变乱无常情形，他实施了联庄团练收养游民之法，由地方宗族等分摊经费，收养游民。有8000余名游民，被转化为义勇，作乱因素转为维稳力量。鸦片战争爆发后，台湾突出海防前沿，抗英备战成为头等大事。为守卫台湾，姚莹与台湾镇总兵达洪阿采取了封港、巡防等措施，又动员组织团练、义勇等民间力量参加抗英活动。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1841年9月29日），一只双桅大号英船拖带舢板多只移泊鸡笼

口外万人堆洋面。次日即发生了“鸡笼破获夷舟”战事，即“鸡笼大捷”。此役斩敌 32 人，生擒 133 人，缴炮 10 门。九月十四日又在万人堆驱赶了一艘英船。次年正月三十日（1842 年 3 月 11 日），在淡水、彰化交界之大安港发生战事，即“大安之捷”。此役毙敌数十人，生擒英军 30 人、广东汉奸 5 人。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战役结局而言，这两次是清方仅有的“奏捷”记录。姚莹以功赏加二品顶戴。十月十九日，侵华英军首领璞鼎查指责达洪阿等冒功，妄杀英人。道光皇帝指示查办。次年三月初六日，姚莹、达洪阿被带回内地。八月十三日，入刑部狱。二十五日，上谕加恩免治其罪，遂出狱。这一事件，曾轰动当时舆论界，史称“台湾之狱”。

二十三年十月，姚莹奉旨发四川同知知州用。次年约六月底至成都后，改补府属蓬州。九月，四川总督宝兴委任姚莹赴里塘调解乍雅两呼图克图纷争事件。十一月十二日，到达正呼图克图曲济嘉木参所驻之里塘。不久上报两呼图克图不可调和之情形，建议以武力稍示震慑。十二月二十二日，返回成都，其用兵建议未被采纳。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姚莹戴着处分奉命随同宣瑛再赴乍雅。经过反复调解，仍无果。次年二月二十六日奉命返抵成都。两次乍雅之行，实地了解到藏区、藏边以及世界史地情形，写出了《康輶纪行》一书。二十六年五月，赴蓬州任。在任期间，设法清除吏治积弊，根治强买强卖恶俗，发展文教事业。二十八年二月，卸蓬州知州事。五月底返回家乡。

二十九年三月，应两江总督李星沅邀请到达金陵。旋以李病休而应两江总督陆建瀛之聘，编成《海运纪略后编》。期间，曾应淮南监掣同知童濂之聘，主持修《南北史注》。三十年七月，到扬州参与盐政事务。次月，到九江任盐卡委员。十月二十八日，咸丰皇帝宣布耆英等罪状，姚莹、达洪阿冤案因以平反。不久，姚莹授湖北盐法道。

咸丰元年（1851）二月，以太平军烽火蔓延，姚莹奉旨驰往广西军营。六月，任大营翼长。不久升任广西按察使。闰八月，奉命由桂林驰往阳朔、荔浦一带防堵。九月上中旬，会攻龙眼塘、水窠、莫家村等地，均为太平军击退。二年六月，入湖南，卸翼长事，办理粮台。不久改署湖南按察使。十二月十六日，病逝于长沙。以桐城为太平军攻占，暂厝于江西鄱阳。同治元年（1862）三月，归葬于桐城龙眠山。

姚莹不仅以事功名垂青史，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有重大贡献，在中国

近代尤其是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其思想价值而言，关乎思想、学术发展方向的，撮其大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睁眼看世界”的先驱

以今人的视角，对姚莹在思想史上的定位，首先应是“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姚莹从嘉庆年间就开始研究边疆史地，比龚自珍和魏源还要早些，而且与龚、魏等同时期其他学者相比，他可能是最早留意观察外国势力觊觎中国动向的人。

他在诗作中，对嘉庆年间广东地区洋货盛行、十三行洋商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交往情形就有一些记述。如《荷兰羽毛歌》咏道：“或言重货兼重人，红毛来者如上宾。众商接待皆屏息，一语不合红毛嗔。”将外国人的盛气和洋商的丑态勾勒得活灵活现。

嘉庆十五年（1810），他在《上座师赵分巡书》中评论两广总督百龄招降海盗张保仔时，指出可能带来三害，其中之一就是“军伍废衄，不闻戮罪，转以为功，夷人、瑶户皆尝窃笑之矣。……且夫粤地内有瑶黎杂处，外有番夷往来，我之虚实彼皆知之，今吾官军骄至不能戢定内贼，不虑有以启彼戎心乎？”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事件可能诱发外国势力对中国的轻视和觊觎。

在与松筠的交往中，他得到了许多关于西北边疆史地以及中俄交往的知识和信息，还时常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向松筠请教和核订，后收入《识小录》一书。《康熙纪行》自叙追述称：“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

他又是最早觉察并提出预防英国等西方势力侵略台湾的人。赴闽、台任职，对海疆潜在危机有了进一步认识。道光四年，当他得知夷船贩卖鸦片盘桓台湾长达半年时，立即写信给台湾道孔昭虔，建议提高警惕：“及往来台湾，海道既熟，又见我海防之疏、水师之懦，万一回至彼国，言及此地本红毛旧土，忽起异谋，能保无他日之忧耶？……抑莹更有虑者，时议惧生边衅，每遇外夷滋事，往往假天朝恩德宽大为言，而实示之以弱，殊不知损国威即失国体。嘉庆二十四年英吉利之至天津可为明鉴。当事者只取省事目前而不顾启外夷轻视中国之心。彼水师既啖其利，又畏夷船高大，不敢驱逐。赵公此去，彼必诡言以对，甚或张

大其词，以相恐惧，皆未可知。”（《上孔兵备书》）

他还是最早发觉并提醒关注西南边疆尤其是藏边的人。1845年，他就发觉外国势力对藏边的威胁，“盖披楞欲窥西藏，为廓尔喀所阻，哲孟雄路近而小弱，故思取道于此。”（《哲孟雄听披楞通道》）1847年致信林则徐，指出中国滇、蜀、藏西南边疆存在严重危机，“英可（由哲孟雄）长驱入藏矣”（《候林制军书》），呼吁人们警惕英国侵略势力。

需要指出，与同时代其他人相比，姚莹“睁眼看世界”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他不是鸦片战争刺激下才“惊醒”的；二是他从“知己知彼”这一传统理念出发，在面对中西力量接触和碰撞时，始终坚持主动地了解外部世界、把握国际形势变化，借以研究和确定中国的应对策略。可以说，在“睁眼看世界”潮流中，姚莹是个真正的弄潮儿。

从20多岁起，他的学术视野就扩展到边疆史地和域外情势，留意搜集和研读有关资料，先后搜集到《海岛夷志》、《海国闻见录》、《坤舆图说》等等。在台湾通过审讯英俘、应邀登上英舰等活动，亲自了解掌握世界知识信息，观察感受异域人文风情。到晚年，几乎从正史到野史笔记，从前人记述到魏源等今人最新研究成果，从林则徐组织翻译结集的《四洲志》到从英俘那里得到的外文书，凡关域外的书籍，能搜集到的他都尽力搜集。他还曾打算编辑一套《异域丛书》。

《康輶纪行》是姚莹著述中最为今人所熟知和重视的一部书，被誉为与魏源《海国图志》相媲美的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作。其实，它只是一部兼具日记、游记、学术随笔特征的大杂烩似的著述，从体例和份量上说，都不能与《海国图志》相比。但是，其思想价值和意义，却丝毫不减于魏氏书。就“睁眼看世界”而言，该书的价值和意义有：

1. 对“西洋各国情事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姚莹吸收了截至当时所能收集到的研究成果，在书中对世界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

2. 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介绍了西藏边疆史地，尤其是最早提出了警惕外国势力对藏边的威胁和侵略的问题。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姚莹在书中对西藏的地理、交通、物产、气候、历史、宗教、政治、风俗等等做了详尽的记述，对西藏与域外各国之间的关系和交往进行了阐述，揭露了英、俄两国对西藏的觊觎之心和相互之间的矛盾。

3. 在核心价值观方面，体现出“东方文化派”的特征：书中有大

量记述、分析、比较宗教文化的内容，对源自东方的儒家以外的宗教文化都有所批评，但以为皆是有益于人们向善的，因而都抱一种包容态度，而对来自西方的以天主教、基督教等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则深恶痛绝。尤其是，除与同时代先觉者一样关注西方的军事、经济侵略外，他更重视和警惕西方宗教文化的侵略及其危害性。

4. 抨击历代“不勤远略”的政策，批评知识分子热衷权位名利、不关心域外情事的态度和做法。指出鸦片战争的失败应归咎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暗昧无知。书中说，英、法、美甚至越南等亚洲国家都对华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皎然者矣。”（《复光律原书》）因此呼吁为“制夷”而放眼世界、了解世界、研究世界。“余谓：外蕃之敢为奸诈欺中国者，以中国无人留心徼外事也。苟每因其来，有人焉，访其山川疆域、国制民风，互相考校，久之必得其实，则彼一有奸欺，我有所据以折之，彼知中国有人，自可销其邪慝。”（《明臣议抚驭外夷》）姚莹在书中反复表达和强调了他自己不畏艰辛和讥讽，忍辱著书的宗旨：“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与余小坡言西事书》）就是要“知彼虚实”，“习其山川，则知形势之险易；习其人物风土，则知措置之所宜”，“徐图制夷”（《详考外域风土非资博雅》），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复光律原书》）

不过，对异域知识，在思想态度上，他又表现得异常冷静。最明显的是，他对来自夷人（西方）的东西，既没有视之为洪水猛兽（宗教除外），也没有视之为神丹妙药；既承认“夷人之长”，又没有妄自菲薄；既主张“知彼”，甚至吟咏出“且喜将军能好武，亲成战舰在中流（时楚省仿夷制新成战舰）”（《四月四日舟泊汉阳风雨涉江偕友人携浚昌登黄鹤楼即事》），也没有像魏源那样明确提出“师夷”的口号。现在看来，他的思想张力或拓展性较大，但是其演进却是慎重的、拘谨的。我们或许可把他的这种见解和认识，看作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在那个时代自然而然孕生的，也是所需、甚至所应持的思想态度，我们应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他、评论他。他是“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却不是向西方学习的旗手，虽是遗憾，但对这样一位杰出的先觉者、理性的开明者，理应给予充分肯定。事实上，历史也已经给予了他崇高的赞礼。

嘉、道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

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经世派中，姚莹是一位极具特点和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若横向比较，姚莹的经世思想的产生，可能晚于包世臣，而早于龚自珍、魏源。

姚莹终生恪守的是经世致用的人生观。束发就对“奸回鄙吝，嫉如寇仇”，而追慕古代名臣贤豪之所为，“乃悄然悲宇宙辽阔，惧此身之委于草露也”（《覆汪尚书书》），萌生了经世之志。成年后，“望古常存屈贾悲，感时欲上天人策。”（《杭州晤徐六襄》）尤仰慕贾谊、王阳明之为人，因为二人学术体用兼备，不为空谈，且有政务实践，利国惠民，成就伟绩。他曾在给马瑞辰信中说：“吾辈立志本不在温饱，亦不畏权势，苟能一言一事于斯世有益，所获多矣。”生平所修都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交都是奋发有为之士，所究都是世道人心、国计民生之事，所为也都是安邦济民、造福一方的事业。其评人论事，也一以经世致用为标准。如评郑兼才：“君生平论学以植纲常为主。一官所至，辄兴工营建，诸事皆有成功。尤以吏治民风为亟。每建言大府，陈利弊皆切要，文尤精悍朴老，为时所重。”（《郑君墓表》）对管同、吴嵩梁等许多友人拥经济民之怀，而徒以诗文闻名者，每每惋惜不已。

姚莹经世思想内涵丰富，这里只能提要介绍。

哲学思想。在世界本原问题上，姚莹是个“气”一元论者。他认为，世界的本体由气构成的。“天无形质，以气为体”（《天人一气感应之理》），“人之始生，本二气之精，与星辰同体”（《达赖刺麻顶上云气》），“万物之生，皆二气之动使然”（《守其知者无七情》），草木其细，山川其巨，有生命无生命者，莫不由气生成。气是运动的，所谓“触物必动，透窍必出”，“气无不出”，因而，天地万物都处在运动之中。事物的运动构成了各自不同的形态和特征，宇宙也才因此多姿多彩，万般气象。事物运动的客观性也是由气决定的，“盖天地万物无非一气运行，而万物各受天地之气运以自为其生，……夫气运流行，天亦不能有春秋而无冬夏，日月不能有盈满而无亏蚀，山川不能有流峙而无崩竭也，况于人乎？”（《墨子非命》）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所有事物和运动都存在一种支配力量，即是“道”（或称“天道”）。他所描述的“道”或“天道”实际上